

序言

若論「漢語神學」何時開始關注「跨學科」的進路，我可相告，早自二〇〇五年甚至更前，我們已確認漢語神學其中一個「天然」特質，就是其學術研究必須與不同的人文學科進行整合。¹當年我與一眾學術委員都意識到，生發於中國人文學界的漢語神學相比於西方學界的神學研究，其中至為關鍵的分別在於自一九四九年起，中國大陸的大學不再設有西方大學式的神學系或宗教學系；這正是漢語神學的特殊生存環境，因此漢語神學的「天然」生存特質必然是「跨學科的」，²這也是研究所在此「偶然性」的條件下生存了十數年；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有意

-
1. 見二〇〇五年秋《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訊》，總監的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瞻漢語神學〉：

二〇〇五年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在中國雲南玉溪的撫仙湖旁，一眾多年只問耕耘不問收成的漢語神學人（教內和教外）共聚一堂，回顧和前瞻漢語神學的過去和未來。經過多天的熱烈討論，漢語神學的面貌逐步清晰：

一、人文性：漢語神學既是發軔於中國人文學界，其生存形態自然以中國人文學界為依歸，中國學者將致力從人文精神和多學科角度探討基督教思想和神學，並力促漢語神學成為中國學術傳統的組成部份，與中國傳統文化（儒、道、佛）和當代文化（馬克思主義和當代思潮）並駕齊驅，公平競爭。

二、宗派和跨教派性：漢語神學不從屬某一個宗派或教派，它的立足點是歷代基督教的思想和神學資源，內含猶太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新教。

三、跨文化性：顧名思義，漢語神學是由漢語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組成，中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和整合就構成漢語神學的活力，其中雙向性的翻譯、詮釋、吸納和創造是生生不息的。

2. 見二〇一一年秋《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訊》，總監的話〈為此我們鍥而不捨〉：

漢語神學在面對起伏多變的學界潮流時，他還是一如既往按發展階段循步漸進，從起步的文史哲合作學科擴展至聖經研究、宗教社會學、宗教對談和公共神學等領域，並繼續努力建設其跨學科整合的成果。

識地把漢語神學的生存特質從「天然性／偶然性」轉化成「必然性」，並以「轉化性創造」³的思維對漢語神學進行跨學科的探索。⁴

自二〇一一年起，跨學科的漢語神學基本定調，從此我們展開不同領域的探索。由於兩岸三地的神學學界沒有太多跨學科的經驗，我們遂向西方取經，吸收其經驗和研究資源。

在多位年青學人協助下，⁵研究所分別與美國普林斯

-
3. 見二〇一二年春《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訊》，總監的話〈漢語神學的是與非〉：

轉化性創造其重心不是「轉向他式」，既不是轉向西方，也不是轉向萬里之外；更不是「退回舊式」，既也不是轉向老祖宗，也不是轉向毛澤東，轉向千百年之前；而是「創造自式」，即創造一套立足於現代中國人生存發展的社會形式，肯定和吸收普世價值，又不就範某一既定的西方範式；開拓中國古代資源，又拒絕被固定為某一現有的中國模式，透過「轉化性創造」，走出一條現代中國自己的路。

另見二〇一三年秋《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訊》，總監的話〈「聽其言、觀其行」的漢語神學〉：

我們並沒有一套特定的思想體系輸入中國，反之我們更重視契合中西學人在雙互尊重和平等的原則下進行跨學科的整合以達至「創造性的轉化」，形成一個嶄新的知識體系為中國學界所認受和吸收，從而豐富中國學術之多元性和回應中國現代性的挑戰。

4. 見二〇一三年春《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訊》，總監的話〈跨學科、共色和本色的漢語神學〉：

漢語基督教研究正展開更為精細和專業分工，例如神學研究（爬梳基督教的大小傳統和各自的思想流派）、聖經研究（原典原文的文本詮釋和跨宗教的經典辯讀）、文化進路（後殖民研究、女性主義和生態進路）、人類學及宗教社會學的田野調查（不同地域、民族和共同體的實證研究）、歷史學（考察基督宗教不同的派別、中國基督教傳播史的人物、事件、問題）、宗教對話（儒釋道與耶教對話）、公共神學（對比歐洲與英美的異同）等眾多研究進路。由此可見本所背負的漢語神學正步入專業化及精細化的跨學科整合之路向。

5. 分別是曾出任美國普林斯頓神學研究中心（Center of Theological Inquiry）駐所學人的謝志斌教授（同濟大學），曾任德國海德堡大學國際跨學科神學研究中心（Forschungszentrum Internationale und Interdisziplinäre Theologie）研究助理的瞿旭彤教授（清華大學）和洪亮教授（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所自身早自二〇〇五年已與德國海德堡大學國際跨學科神學研究中心結盟，並合作翻譯其跨學科研究成果為漢語：波爾霍恩、韋爾克編，王濤譯，《世界的終結——從科學與神學看終末》（香港：道風書社 2010）；John Polkinghorne & Michael Welker (eds.),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the Ends of God*:

頓神學研究中心 (Center of Theological Inquiry)、德國海德堡大學國際跨學科神學研究中心 (Forschungszentrum Internationale und Interdisziplinäre Theologie) 和公共神學全球網絡 (Global Network for Public Theology) 取得聯繫，這幾所機構在跨學科的神學研究上取得國際公認的成就；各方接觸後一拍即合。對於西方伙伴來說，研究所搭建的大學網絡正是他們需要尋求合作的對象。對於我們來說，促進中西方學界的互動和合作正是漢語神學賴以生成的動力之一。從此，一系列連續和相關性的學術活動得以展開，包括：

- 二〇一二年七月：研究所與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聯合主辦第五屆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圓桌會議「漢語基督教研究：一個跨學科研究的視角」。
- 二〇一四年七月：出版《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 41 期，在其主題「漢語神學二十載」中，明確將「漢語神學的生存形態」界定為具「跨學科」的特質。
- 二〇一五年十月：與同濟大學合辦「宗教與社會公正」國際跨學科研討會。
- 二〇一六年七月：舉辦「中國處境下的宗教——政治關係：以基督宗教為個案的跨學科整合」研討會。
- 二〇一七年九月至十二月：舉辦第一屆跨學科訪問學人項目，研究專題為「尊嚴、道德與權利：基督教神學與跨學科研究的整合」和相關的國際研討會，本所駐內地研究員、同濟大學謝志斌教授出任項目主持。
- 二〇一八年九月至十二月：舉辦第二屆跨學科訪問學人項目，研究專題為「風險與希望」，本所駐海外

Science and Theology on Eschatology (Harrisburg, P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2000)。

- 研究員、墨爾本神學院林子淳教授出任項目主持。
- 二〇一九年七月至十二月舉辦第三屆跨學科訪問學人項目，研究專題為「信任」，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瞿旭彤教授出任項目主持。
 - 二〇二〇年七月至十二月以線上方式進行了第四屆跨學科訪問學人項目，研究專題為「待客與自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楊俊杰教授出任項目主持。
 - 二〇二一年七月至十二月將舉辦第五屆跨學科訪問學人項目，研究專題為「數字技術時代的人觀：身體與身體性」，本所特聘研究員、中國神學研究院洪亮教授出任項目主持。

在運作上述跨學科研究項目時，我們特別感謝洛溫教授（Robin Lovin）⁶和毛登博士（Joshua Mauldin）⁷的支持和參與，尤其是他們於二〇一七年選編出版的《作為跨學科研究的神學》（*Theology as Interdisciplinary Inquiry*），⁸其中多篇跨學科的方法論和個案研究均成為我們工作小組的討論文件。有見及此，我和志斌兄遂決定精選這書的部分論文遂譯出版，同時邀請相關的漢語神學人撰文分享近十年的跨學科經驗和研究成果，末後四篇附錄更以不同的角度呈現多樣化的跨學科漢語神學的面貌。

期盼本書的出版有助推動在中國學界日漸普及的跨學科研究，裨益和豐富中國學術。

6. 曾於二〇一二至二〇一七年期間出任普林斯頓神學研究中心的研究總監。

7. 現任普林斯頓神學研究中心副主任。

8. Robin Lovin & Joshua Mauldin (eds.), *Theology as Interdisciplinary Inquiry: Learning with and from the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7).

楊熙楠

草筆於二〇二一年三月

道風山蓮德樓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神學作為跨學科的探求*

——謙遜與盼望的美德

洛溫（Robin Lovin）、當尚（Peter Danchin）、富恩特斯（Agustín Fuentes）、米塞爾（Friederike Nüssel）、波普（Stephen Pope）

楊柳 譯

當一位對神秘主義感興趣的神學家詢問一位神經系統科學家應當如何詮釋一段中世紀文本時，這件事是不同尋常的。當一位研究進化的人類學家請教一位宗教史家，幫助他理解社會協作是如何影響人類對其進化生存位置（evolutionary niche）的再創造時，這恐怕更讓人意想不到。當一位法學學者和一位神學家都對美學感興趣，以試圖理解法律權威與宗教敬畏的共通之處時，新的研究範圍也隨之打開。這些不太可能的對話正在越來越頻繁地發生着，而且不僅發生在同事之間的偶遇中，還發生在有組織的跨學科討論中，後者共同推動了多個領域的進展，為將來的研究設定了方向。

神學家尤其一直活躍地參與這些討論。很多新的神學思潮的肇始可以追溯到神學家對諸如生命起源、宗教

* 本文譯自 Robin Lovin, Peter Danchin, Agustín Fuentes, Friederike Nüssel & Stephen Pope, “Introduction: Theology as Interdisciplinary Inquiry: The Virtues of Humility and Hope”, in Robin Lovin & Joshua Mauldin (eds.), *Theology as Interdisciplinary Inquiry: Learning with and from the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7), pp. xiii-xxxii。得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允准翻譯轉載。——編注

的社會角色、信仰的心理學等難題的回應，然而，如果沒有接觸性別研究、社會學、心理學、醫學、自然科學、政治理論、批評理論，這些神學家的工作就不可能產生。近年來，湧現出一些卓越的研究，從不同學科多視角地聚焦種種存在已久的人的問題。比如，休斯滕（J. Wentzel van Huyssteen）找到了對人類獨特性的科學研究與對人類獨特性的宗教理解之間的接觸點。沃爾德倫（Jeremy Waldron）論證了關於人權的現代觀念與關於人類尊嚴的宗教理念之間所存在的歷史上與概念上的關聯。康納（Melvin Konner）將進化生物學、心理學與靈修學詳加融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有關童年的論述。¹

本書^{*}的目的在於引起對不斷增長的這類工作的關注，並鼓勵對跨學科神學探討的可能性予以更廣泛的神學反思。開展這些探討的神學基礎是甚麼？教義與傳統的哪些方面適宜這種發展，而哪些方面會抗拒？在接觸其他學科時，神學家應該帶入甚麼樣的態度和價值觀？他們應當如何理解日益期待着他們去探索的多種認知路徑？

一、本書的構成

在引論中，我們集中於跨學科研究的歷史以及它對作為一種學科的神學所提出的一般性問題。我們從倫理學、神學、法學、人類學的視角出發，詢問關於神學的

1. J. Wentzel Van Huyssteen, *Alone in the World? Human Uniqueness in Science and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06); Jeremy Waldron, *Dignity, Rank, and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Melvin Konner, *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 Relationships, Emotion, Mi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正文中「本書」指 Lovin & Mauldin (ed.), *Theology as Interdisciplinary Inquiry*，本文為該書的引論。編注中之「本書」指《跨學科與漢語神學》一書。下同。——編注

現狀這些發展能告知我們甚麼，對神學的未來又能預測甚麼。然後，在本書的中心，六位學者提交了他們自己的研究，這些研究以新的富有創造性的方式，把神學與其他研究領域結合起來。在本書末尾，一位神學家將帶着建設性的眼光回到上述問題，探討神學在新的跨學科知識環境中面對挑戰與機遇時有哪些可能性。

這六篇跨學科神學的論文反映了各位學者多年來學術研究的核心關切議題，*但這些研究尤其脫胎於他們在「神學研究中心」（Center of Theological Inquiry）所作的一個為期三年的項目。該項目由鄧普頓基金會（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贊助，將研究團隊集結在一起，對進化與人性、宗教經驗與道德身份、法律與宗教自由進行集中的、跨學科研究。在第一篇論文〈透過深層歷史的鏡頭看人類〉（*Looking at Humans through the Lens of Deep History*）中，迪恩－德拉蒙特（Celia Deane-Drummond）借鑑了新的思考人性形成的方式，以探索生物主體與進化在生存位置構建（niche-construction）中的互動，在此過程中，隨着時間的推移，物種不僅去適應它們的環境，同時也去創造它。對人性如何形成以及人性與其他動物如何相關這一問題的更複雜的進化的認知，使得對人性的更複雜的論述成為可能。這種論述不僅符合基督教傳統，且無須否定科學解釋的完整性。同時作為生物學家與神學家來看待這些問題，迪恩－德拉蒙特意識到跨越學科邊界的相互理解所涉及的美學要

* 本書選譯了 Lovin & Mauldin (ed.), *Theology as Interdisciplinary Inquiry* 的導論和結論，及其中的三篇論文，即〈透過深層歷史的鏡頭看人類〉（*Looking at Humans through the Lens of Deep History*）、〈在神聖的（心靈的）形象中〉（*In the Divine [Mental] Image*）和〈法律、神學與美學〉（*Law, Theology, and Aesthetics*）。——編注

素。這種「藝術」在常規的調查方法中被捕捉到有多難，它對於我們的發現就有多重要。

接下來的三篇論文提供了當代學者在尋求對道德生活、聖經文本、靈修學經典著作的新的見解時，在心理學、神學以及歷史研究之間發展出的豐富對話。在〈道德生活與理性自我的結構〉（The Moral Life and the Structures of Rational Selves）一文中，*斯佩齊亞（Michael Spezio）從神學轉入道德認同（moral identity）的心理學，認為神學中富含的道德生活現象學可以與對道德選擇和道德承諾的實驗研究相結合。如此一來，我們發現了一種與真實的人類生活和選擇更相關的認知科學，以及對神學倫理的中心概念即「代價高昂之愛」（costly love）的真實案例有更好理解的神學。

在下一篇論文〈在神聖的（心靈的）形象中〉（In the Divine (Mental) Image）裏，尚茨（Colleen Shantz）從另外一個視角尋求心理學與宗教經驗的關聯，證明了對心理學的深入了解可以幫助聖經學者識別一些認知結構，這些認知結構跨越了我們與文本之間的歷史文化距離，使得經文中對人類經驗的記載令人信服。人類認知的適應力和反應力既是進化的，也是個人化的，為我們從神學上思考人類與上帝的關係提供了超越靜止的神聖完美圖像的方式，而這種靜止的圖像在神學中最為盛行。

霍林斯沃思（Andrea Hollingsworth）對庫薩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的《論上帝的觀看》（*De visione Dei*）的研究**展示了，一部西方靈修學的經典文本怎樣預示着

* 此文收於 Lovin & Mauldin (ed.), *Theology as Interdisciplinary Inquiry*, pp. 23-49。——編注

** Andrea Hollingsworth, “Nicholas of Cusa’s Mystical Theology in Theological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 Textuality, Intersubjectivity, Transformation”, in Lovin

現代心理學關於認知轉換的洞見。很顯然，尼古拉悉心構造的屬靈操練不僅旨在把讀者引向啟示的片刻，還要使他們理解上帝、理解世界以及理解自身的方式產生持久的變化。對於經驗如何在實質上改變大腦的神經系統科學認識可以表明，這位十五世紀神學家的見解具有更廣泛的相關性。同時它加強了尼古拉神學的現實主義。神學不僅僅是觀念的體系；它源自經驗。

另外兩篇論文從心理學、進化生物學以及人性的考慮轉入在社會層面上對法律與宗教自由的理解。在〈宗教迫害與宗教自由〉（*Religious Persecution and Religious Freedom*）一文中，*伯吉斯（John P. Burgess）寫的是俄國東正教中對在十月革命後遭受迫害的數百名「新殉道者」的崇拜。一種熟悉的人權話語促成對宗教自由的政治性表述和宗教性表述，但是，出現於後蘇聯時期教會的宗教自由的理念向西方有關個人自由的平常理念施加了相當大的神學壓力。它也提出了如許問題，即，個人的宗教自由比法律本身更持久、更獨立，然而，當沒有體制機構的支持時，個人的宗教自由如何能具備政治上的意義。

奧康奈爾（Mary Ellen O'Connell）將法學、神學、美學多個學科的視角彙聚在一起，以探詢甚麼使得法律對人類和人類社會產生強制力。隨着現代法律越來越少依賴於神學和倫理，法律權威的性質問題變得越來越迫切，然而，法律權威的學科孤立提供不了多少答案，除了給出一個實證主義的解釋，即法律就是有權威頒佈

& Mauldin (ed.), *Theology as Interdisciplinary Inquiry*, pp. 68-90。——編注

* 此文收於 Lovin & Mauldin (ed.), *Theology as Interdisciplinary Inquiry*, pp. 91-111。——編注

它的人所頒佈的。奧康奈爾超越這些論述，提出法律的力量從根本上來說是美學的。通過論述敬畏感引發秩序，她在對法律的更為古老的神學敘述與關於法律權威更受約束的現代觀點之間建立了聯繫。同時，奧康奈爾的論文為跨學科探討的性質提供了反思，它呼應了迪恩－德拉蒙特的建議，即跨越學科邊界的相互理解「乃建立在真善美的經典的聯繫之上」。²

這六項研究並非不加批判地接受他們所接觸的其他學科的結論，也不指望神經科學或者心理學、法學哲學來解決有爭議的神學問題。他們更不是爭取讓神學成為人性與社會可能性之間分歧的仲裁者。確切地說，他們代表着一種神學研究的進路，這種進路與許多不同學科的發展相呼應，挑戰着來自這些學科內部的排他的主張，以求為複雜的現實提供完整的看法。神學中這些新的進路之所以與其他學科成功協作，恰好是因為他們並不追求消除差別。他們的工作不是以單一的研究方法或者限定的意識形態委身為特徵，而是以一些思維習慣為特徵，這些思維習慣能夠導致共同的理解，並使更進一步的研究成為可能。

在這些思維習慣中，本引論尤其聚焦於謙遜與盼望的美德。為了弄清楚它們對於與其他學科接觸的當代神學為何重要，我們首先必須理解與之截然不同的學科思維的習慣，這些習慣似乎使得謙遜與盼望無關緊要。我們將從追溯現代研究性學科如何產生，以及神學如何在它們中間找到其位置開始。

2. 見迪恩－德拉蒙特，〈透過深層歷史的鏡頭看人類〉，本書頁 63。